

从毛泽东到胡锦涛：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叶蒙荻

摘要：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九十周年，在跨世纪的伟大征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作者简介：叶蒙荻，男，副教授，硕士。（浙江传媒学院 宣传部，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3-0074-05

201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九十周年。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我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先后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凝聚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几代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懈求索的心血和智慧。

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后，摆在自己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消灭私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借鉴苏联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农村经济落后，个体农民人数众多的具体条件出发，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上，采取了逐步过渡的形式和步骤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类似于对个体农业的方法，对个体手工业进行了改造。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方针，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地完

成，从而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武力剥夺的道路。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工作中的弊端，给中国共产党人有益的警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1]针对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等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冲破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开始考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这一时期形成了对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深刻认识。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最早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命题，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进行了初步论述。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

《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初步自觉。毛泽东在1957年2月做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口号。在上述讲话和报告中，毛泽东还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建设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等矛盾关系。毛泽东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矛盾的剖析，提出了搞社会主义建设要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正确处理上述矛盾，实际上就是在消除苏联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他指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还不甚了了”。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发出了要努力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3]

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理论前提。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建设划分为发达和不发达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毛泽东提出的超越当时计划经济模式的思想，包含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萌芽。但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缺乏处理复杂矛盾的经验，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满怀期待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相当曲折和复杂的路程，其中也有过重大失误，但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过失误而否定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二、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精辟指出：底子薄，人口多，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社会生产力落后，这种现实国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基本点，是制定我国建设蓝图的基本出发点。^{[4] (164)}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思想。他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5]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发展，邓小平牢牢抓住时代主题的新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两大根本问题，创造性地形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思考怎样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逐步深入的。邓小平首先指出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他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留在很低水平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论述带有明显的拨乱反正的时代痕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集大成者。邓小平倡导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文选》三卷中，三十多处反复强调要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先富思想”，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平均主义”的重大突破，对解放人们的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邓小平设计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概念。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

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发轫于抗日根据地时期号称“红色特区”的太行山上。邓小平在太行山时期就认识到经济发展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思想。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的黎城高干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的重要论断,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要奖励。”1943年,邓小平在他的光辉著作《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精辟地指出:“敌后的经济建设和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与抗日根据地发展的辩证关系,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思想源头。这些思想成为邓小平经济富民思想、经济改革思想,对外开放思想的早期萌芽。

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208)}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有一系列相关论述,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高度概括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构成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系统理论。

8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认识、新观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全面深刻地总结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经验教训,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关于市场经济是手段的观点;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的观点;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关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观点等等。这些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为突破和越过改革面临的难关,进一步开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改革开放向纵深阶段发展。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十四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和外部条件等方面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江泽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探索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深刻反映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阶段。

江泽民刚刚出任党的总书记,便在全会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表示: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执行。江泽民还坚定地说,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在以后十多年的历史中,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坚定诺言。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新理论。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6]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还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加强这三方面的建设，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7]这是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的基本构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

在党的建设方面，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核心的党建新理论。在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这是摆在全党上下的一个亟待回答的时代性课题。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深入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就是因为她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对共产党本质的科学概括，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江泽民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它们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江泽民指出，这十二个关系是在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四、胡锦涛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凝练和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6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升和丰富发展，标志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思想。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思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命题。社会和谐思想古已有之，面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凸显、风险增多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既承载了千百年来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又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在第六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再次呼吁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系统观、整体观而提出的全球政治伦理、法律与国际关系建设的伟大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世界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更高境

界、更广范围的和谐社会思想,两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外发展的新格局。

第三,确立了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粗放式发展造就GDP增长神话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资源环境压力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中国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跨越,从制度改变、体制转换到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极其深远的时代意义。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努力把握发展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解决发展难题,对发展观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全面阐述。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首次指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7年,胡锦涛“6·25”讲话中再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系统概括。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新阐述。科学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最终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表明我党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四,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它既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障。

第五,形成了“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2010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致辞中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已将“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纳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之中。“包容性增长”体现了发展对生态的包容、对民生的包容、对和谐的包容、对三农的包容、对非公经济的包容,五个包容浑然一体创新为一个系统工程。^[8]这是党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之后,在执政理念上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已走过近九十年光辉历程,九十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党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开放,铸就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共四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彰显继承与创新演进路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示范意义。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正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还将迎来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吴冷西. 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 4-5.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999: 369-370.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829.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05.

[6] 江泽民.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89-10-01.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646-1647.

[8] 陈永昌. 探析“包容性增长”的五个内涵[EB/OL]. 新浪网, 2010-10-18.